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XING^{ZHUAN}
SHEHUI
DE^{ZHONG}
ZHENGZHI
FAZHAN

转型社会中

的
政治发展

郭强 著

ZHUANXINGSHEHUIZHONGDE
ZHENGZHIFAZH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社会中的政治发展/郭强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11

ISBN 7-311-02488-9

I. 转... II. 郭... III. ①社会学—研究—中国
②政治—研究—中国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3441 号

转型社会中的政治发展

郭 强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残联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9 千字

ISBN7-311-02488-9/C. 46

定价: 17.00 元

前 言

I .关键词:转型社会与政治发展

发展中国家都是转型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都将经历前后两大阶段。转型前期是传统社会解体、新旧体制摩擦、社会阶级阶层大分化、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转型后期是断裂化的社会因中间阶级的崛起而逐渐弥合、社会矛盾逐渐缓和、新体制逐渐系统化、现代社会逐渐成型的时期。从社会团结角度看,转型社会从前期到后期呈现为一个明显的“U”型。对所有转型中国家来说,以最快时间最小代价度过困难的转型前期都是其中心问题。

19 世纪以来的中国一直有两个噩梦和两个美梦。两个噩梦,一是担心重新陷入崩溃—重建—崩溃的历史循环,一是恐惧被外来的侵略者欺辱、统治或瓜分。两个美梦,一是实现现代化,一是渴望民族复兴。在噩梦与美梦间,中国进入了她的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型时代。这个时代开始于 19 世纪,贯穿 20 世纪,可能到 21 世纪末才能结束。

为了避免转型前期的痛苦与震荡,在转型初期,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家就提出中国要走一条避免西方那种社会分裂阶级斗争局面的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 1949 年建政后选择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东方式现代化道路,但追求共同富裕的努力以共同贫穷而宣告失败,其它试图规避“U”型前半段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成功。到 20 世纪最后十年,绝大多数国家都明白了“U”型前半段难以规

避的残酷现实。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的讲话。在这个吹响中国改革号角的讲话里,邓小平宣布要允许“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回头看,这可能是那篇名垂青史的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它表明中国终于开始直面转型前期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化。忍受社会分化是为了给经济发展腾出时间和空间,而社会分化和经济发展成为转型中国家的悲喜两重天。1992年南巡中的邓小平宣布社会主义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预期了转型后期的方向。

转型社会是风险社会。所谓风险,对一个转型国家来说,就是发展停滞,转型失败,预期中的“U”变成了“L”。越接近“U”型底部,社会分化越严重,社会矛盾越剧烈,社会冲突越政治化,风险也就越大。面对越来越大的风险,转型中国家的领导力量只有以坚定、耐心和智慧持续推动政治发展,才能维持稳定,为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环境。

转型社会中的政治发展追求的不是实现一种特定的目标制度,而是通过总结经验、改进策略、优化机制、试验制度,来增进社会成员关于共同利益的认识,发展利用最低成本维系共同利益的政治技术,推动有利于扩展共同利益的制度变迁,从而实质性地增进制度性的社会团结。

政治改革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手段。所谓政治改革并不等于修修补补或者慢慢腾腾,改革可以有邓小平所谓的革命性,可以采取一些大胆的甚至激烈的手段。改革与革命最大差异不是激烈程度,而是革命为了单一目的可以不顾一切,改革必须兼顾四面八方。政治改革要做到统筹兼顾就需要经验和知识,试验特别是在小而全的局部进行综合改革实验是获取这种经验的最好途径。

II .各章内容提要

第一章:“土地一耕作制度: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钥匙”

农村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大本营,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根源与基础就是农村的转型与发展。1970年代末中国农村以集体农作制度解体为核心的市场化转型启动和支撑了中国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特别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没有农村家庭农作制度的支撑,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将因为无法执行试验 - 渐进式改革战略而面临被迫选择“大爆炸”战略的困境,工业化将因为缺乏乡镇企业和以农民工为主的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的推动而无法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城市化将因为缺乏工业化移民而裹足不前。因为上述原因,本书特别设置了数理经济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第一章来论述家庭农作制度的历史与现实合理性。本章第一节通过数理分析证明,农作合作集体或者不可能存在或者只能以无效率的状态强制存在。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生产长期效率低下原因在于农业合作化,在于农业合作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而不是合作化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偏差。合作化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偏差仅仅是集体农作制度造成的无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即使没有这些偏差,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在集体农作制度下长期效率低下的局面不会改变。本章第二节提出一个天堂预期假说(及相应的常识预期),这个假说可以解释建国以来农业生产绩效的几乎全部波动,包括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的成就——在合作规模和合作程度不断加大情况下总要素生产率持续上升,1959~1961年的农业大危机,1962~1978年农业生产效率的持续低迷,以及1979年以后的农业生产绩效的上升与波动。虽然本章关于农业基本制度的研究是规范经济学的,但其基本结论却具有社会学和政治学价值。家庭农作制度的实质就是农业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这种

基本制度的恢复代表着计划经济在大多数地域和人口中的崩溃。农业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构成整个经济制度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历史前提和制度基础。农业经济制度的市场化不仅为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资源,更重要的是大规模流出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改变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模式。几乎达致无限供给规模的劳动力创造了 20 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也正在通过空前规模的自主社会流动改变着社会的空间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二章:“农民工: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钥匙”

本章第一节概述了农民工的概念、规模、流向以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基本社会特征。第二节在总结当前农民工社会流动原因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一个炫耀—竞争假说来揭示(被其它理论遮蔽了的)农民工流动的部分原因以及农民工流动的实际决策机制。炫耀—竞争假说认为,中国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动力就是社区内特别是同辈群体间、亲戚间的竞争。正是首先流动出去的少量劳动力获得了显著高于当地社区内特别是同辈群体间、亲戚间务农群体的收入,打破了社区内特别是同辈群体间、亲戚间的地位同质性,而这种不平衡被“先富起来”的伙伴的炫耀性消费和对其对外出经历的炫耀性描述给放大了。竞争引发了模仿行为,导致几乎所有同辈群体的外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各地农民工流出率的显著差异,过往的研究主要强调了流出地的人地矛盾,显然忽略了流出地存在的有利于促使第一批打工者产生的原因,第一批打工者的在农村社区的分布广度决定了后来的流出规模,较晚产生第一批打工者的地区的流出率明显低于较早产生第一批打工者的地区。这个理论假设与前述理论的主要差别是:农民工外出的并非因为自己的收入低于发达地区或城市,而是因为其收入低于社区内特别是同辈群体、亲戚中的第一批打工者。这个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农民工流出率最高的地区并非最穷的

地区,最穷地区比如大面积的国家级贫困县并不是农民工流出率最高的地区。第一批打工者产生的原因也并非个人或家庭利益最大化,首先是有流动的特殊个人际遇,其次是有超过同辈群体的动力和能力。同伴竞争本来是一个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流动的非常正面的机制,但由于流入地政府一方面采取二元劳动力市场等隐性制度大大降低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采用户籍制度等显形制度安排大大增加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从而迫使无力市民化又渴望提高社会地位的农民工将主要收入投资到流出地进行类炫耀性消费(建房、操办婚丧大事以及礼物馈赠等)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扭曲的炫耀—竞争机制使农民工宝贵的资本沉淀在实际价值非常低而且快速贬值的事物上,没有为自己和子代的市民化而进行教育和住房投资或储蓄,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发展能力,固化了自己的低下的社会地位。第三节总结了我国农民工流动政策的演变,指出扭曲同伴竞争机制、削弱农民工发展能力、使农民工无法市民化的刚性流动壁垒,经过农民工 20 多年的努力基本被推翻。农民工突破“进入壁垒”,获得了进城就业的权利,但并不等于农民工获得了与市民的平等地位,农民工在城市里将遭遇更多非正式的和隐性的“融入壁垒”。

第三章:“阶级阶层理论研究”

第一节讨论了国人对阶级、阶层的主观认知和困惑,以及阶级概念的敏感性问题。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介绍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的不同取向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阶级观。第四节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关于阶级阶层的理论,提出地位差别与流动壁垒作为阶级阶层最重要的标准与界限。第五节讨论了中国最大最重要的两个阶级以及二者的变化趋势。

第四章:“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之我见”

本章在讨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三大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包括三大分化动力和五大分化机制的阶层分化理论框架和一

个包括三大“阶级”、九大“集团”和十二大阶层的阶级阶层结构框架。三大阶层分化动力分别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五大阶层分化机制分别是制度分割、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劳动分工和收入差距;当代中国的十二大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普通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城市户籍产业工人或商业服务业员工、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农民工或农籍商业服务业员工、农业劳动者、农村贫困人口。这十二大阶层由于拥有的不同数量级组织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而分属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每一个阶级又分别包括上层集团、中层集团和下层集团。

第五章:“中国社会的断裂与转型”

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理论中关于中国社会存在断裂现象和断裂化趋势的基本判断是深刻的,但其对断裂原因的分析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即使不存在“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和全球化这两个基本背景,断裂社会也会出现的,断裂是中国这样的后发大国大转型中必经的痛苦阶段,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只能缓解断裂的深度和广度,但不能弥平之。中国的大转型包含了同时并进的三个层面——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以工业化转型为核心)、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城市化转型为核心)、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新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以市场化转型为核心)。大转型的三个层面均与断裂关系密切。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是断裂内在的和基本的原因;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使得断裂呈现二元或三元的不对称状态;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新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使断裂在短期内大爆发。对于如何控制社会断裂,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培养一个中产阶级。笔者认为,改善中国社会结构,保持中国社会稳定不能寄希望于中产阶级。在数十年内,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

变化方向不是中产阶级化或者中产阶级主体化,而是蓝领工人为主的工人阶级化。中国社会最重要最紧迫最艰巨的使命不是培植中产阶级,而是使农民非农化。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一个历史性转变将是市民化或工人阶级化(工人阶级主体化),第二个历史性转变才会是中产阶级化。目前及今后数十年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第一个转变早日实现。在实现第一个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分化加剧难以避免,要保持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态势,第一要建立公正的社会规则,第二要给下层阶级“加油”,使其能够坚持到第二个历史性转变时期。

第六章:“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二元结构”

鉴于传统产业工人与农民工在身份(市民与农民)、职业、收入、权利以及阶级意识与阶级行动等方面的巨大差别,可以确定,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两个分割、封闭的阶层——传统产业工人(城市户籍工人阶级)与农民工,这就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二元结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二元结构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体制和政策因素,二是经济和社会因素。所谓体制和政策因素主要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分隔体制及其衍生政策。”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体制表现在农民工方面就是农民工体制。农民工体制的基本含义就是“农民”身份加“工”人职业,其实质就是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政治权利之外,使市民整体作为城市这个经济体的“股东”分享“股权”收益,而农民工只能作为纯粹劳动力仅仅“等价交换”工资。通观 20 多年农民工流动政策的变迁,可以说变迁的方向总体看是向有利于农民工流动的方向发展的。但迄今为止,中国关于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依然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首先,这些制度与政策是高度策略性的,不是基于农民工应有平等公民权的宪法精神;其次,这些制度与政策主要是站在城市利益的角度制定的,其宽严程度与城市失业程度高度相关,其有关规定是在承认城市人优先

的原则上确定农民工的权益的;再次,中央的政策允许甚至鼓励地方以户籍为边界的公共产品使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造成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刚性的利益边界,严重压抑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最后,国家至今没有确定“自由迁徙权”为基本公民权。这些制度缺陷使农民工事实上成为劳动在城市的次等公民。造成工人阶级二元机构的经济和社会因素集中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乃是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深刻分割的首要原因。农民工体制或工人阶级二元结构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巨大的绊脚石,如果工人阶级的二元结构被长期化、固定化,工人阶级将彻底分裂乃至对抗,农民工将从巨大的建设力量演变为巨大的破坏力量。取消农民工体制,统一工人阶级应该分三大步骤,也是三大任务——统一城乡教育、统一社会保障、统一对内开放。

第七章:“政治发展理论研究”

本章首先介绍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并着重讨论了政治发展的两个核心问题: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在第二节结合对政治发展理论缺陷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思考。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有三个重要层面:文化与意识形态、知识与经验、制度与方法。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背景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是单一民族单一文化国家,但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不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首要前提和最重要的政治发展就是树立共同体意识。树立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建立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和教派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要建构、传播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对于同族、同教的党派、军阀的混战性斗争,同样需要最基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约束。统一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能否建立、扎根,取决于精英阶层的统一,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统一。在这样的国家,不可避免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必须高度谨慎、非常策略,不能以社会分裂为代价。在知识与经验层

面,转型社会的政治发展想不走弯路就特别需要知识与经验的支撑。政治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也不同于经济知识,它具有高度的适用限制,也就是具有高度的条件性、本土性。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仅仅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发展自己政治知识的线索和理论材料,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往往不重视本土政治经验,忽视发展本土政治科学。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的死气沉沉的政治格局则使得本土政治科学的发展缺乏关键的经验基础。在制度与方法层面,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制度设计上一方面片面推广西方式竞争性民主制度,忽视了民主本身的多元性和本土性,另一方面将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前期不可能存在的强大中产阶级视为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使这些国家陷入两难局面。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必须兼顾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必须非常策略地处理好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关系。第一,在转型前期,一方面要集中权力推动变革,另一方面要建立起顺畅的精英吸纳机制,将精英纳入体制内是建构统一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培养和使用政治人才,防止社会横向分裂和纵向对抗的关键。第二,全面的竞争性民主是转型后期政治发展关键环节,发展中国家应通过政治发展实现全面的竞争性民主,而不是通过全面的竞争性民主来实现政治发展。第三,从集中权力推动变革的转型前期向普及政治参与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之间还有可以称为转型中期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积极推进多层次的民主实践是防止后期政治民主化失范、变质的关键。把握关键就是要掌握转型的主动权,主动的渐进的多层次的扩大政治参与和民主试验就是最好的道路,尽管这种试验同时会刺激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增加政治风险,但这是缓释风险的唯一方法。本书第八章至第十一章分别讨论了中国在这三个层面的政治发展。

第八章:“中国意识形态的变迁与发展”

本章首先在介绍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从概念、基本要素、

政治功能三方面提出了自己关于意识形态的看法,进而提出了政党意识形态变迁的三个方面或类型。第三至七节分别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理论起点和历史起点,以及其从非主流到主导性意识形态,从主导性到一元化国家意识形态,由国家意识形态向主导性意识形态积极调整等历史变迁。第八节通过总结意识形态调整的历史经验,提出意识形态调整越来越难以通过重新解读经典作家的著作而解决,而必须寻求新的理论资源。新的理论资源有三种。一是“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二是“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三是体制改革本身的理论化。第九节指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意识形态)、执政合法性、执政成就之间具有强烈对应关系,其执政合法性既取决于其执政成就,也取决于其意识形态论述的理论完整性和社会认同度。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论述一直采用“先验型”加“经验型”的混合模式,但不同时期论述内容大有不同。当“打天下坐天下”(传统型合法性)和“共产主义领路人”(主义型合法性)的合法性资源越来越稀薄时,中共越来越倚重于“治天下坐天下”(绩效型合法性)和“现代化领路人”(分利型合法性)的合法性资源。中共的意识形态调整虽然淡化了其超越性特征,但它所包含的富强观念和公平意识回应了近代以来的文化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实践在当代的要求,因而获得了公众心理上的认同感。最后一节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未来可能的选择。

第九章:“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化”

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领域就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本章引入一个政治社会学的分析构架,试图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解体这样一个特殊视角,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在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变迁与发展。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是不可遏制的内在要求;对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关系自己执政合法性而必须坚持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在落后国家

执政的共产党面临实现现代化和推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使命,但是追求效率的现代化和追求公平的社会主义存在逻辑矛盾,传统社会主义试图通过计划经济这个桥梁克服二者的冲突。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既能够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快地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又能够同时实现社会公平。然而实践的结果是,计划经济不仅不是发展经济的好体制,甚至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计划经济的失败使社会主义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凸现出来,而转型前期不断加深的社会分化使社会主义的公平信念面临空壳化的危险。邓小平提出的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前两句强调发展,后三句强调公平,这是协调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历史性努力。

第十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本章首先讨论了可持续改革、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稳定,科学改革观、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稳定观这样两组概念,进而论述了政治改革、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政治领域应该树立可持续政治改革、可持续政治发展与可持续政治稳定的观念。所谓可持续的政治发展,就是有效的政治创新可以适时制度化,迫切的政治参与压力可以适时吸纳,政治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适应社会结构的自然变迁,增进社会团结。中国的可持续政治发展,第一不应该抛开现行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应该在先行制度和体制中努力寻求生长点,促进其生长发展;第二不应该寻求一蹴而就的变革模式,那样不仅没有实质性的发展,反而可能造成全面的政治衰败,甚至危及最基本的国家认同;第三不应该被理解为“慢慢来”和无风险发展,无风险的政治发展是不存在的,“慢慢来”可能是走不动,在社会矛盾和政治参与压力比较大比较普遍的时候,政治发展必须以政治改革的方式推进,必须有一定的力度和速度,否则发展的速度赶不上矛盾激化和压力增强的速度,将使正常的和平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两大目标,第一大目标是放弃全

能主义,将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分离,建立市场经济、自由社会和多元文化,第二大目标是建立民主政治。就第一大目标而言,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就第二大目标而言,并不存在单一的最佳突破口,应该同时在各个可能的方向上进行试验,最后哪个方向率先取得历史性突破,那是决心、策略、环境与机缘的共同作用。

第十一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

本章首先论述了中国与苏东改革最根本的差别不是渐进与激进的差别,渐进与激进只是改革的外在形态,不是改革的内在机制。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非因为渐进,而是采用了试验论的改革方法。所谓试验,不仅指先试点后推广,而是包括小、中、大三层试验观:横向试验推广,纵向连续试验,改革就是试验。虽然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有许多差异,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方位试验方法可以全面应用到政治体制改革中来。首先,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先试验后推广;其次,每项较复杂的政治体制改革都要连续试验;第三,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乃是连续性试验;第四,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大试验。试验式政治改革的最佳模式是设立政治改革特区。设立政治改革特区有许多优点:第一,可以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检验各种改革措施的匹配性;第二,可以得到非常接近于自然状态下的比较全面的改革经验;第三,由于是封闭试验政治震荡比不断在全国推广单项改革经验要小;第四,可以集中观察研究改革的负面影响并通过进一步改革寻求克服之道,能够预期改革措施推广后的真实社会反应,并有应对预案;第五,可以训练具有全方位经验的政治人才;第六,有利于改革特区本身的发展。

III .感慨与感谢

这是一本怀胎十年却还是早产的书。十年前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我说,“生命是靠美、爱、成就感、肯定性来支持的,是肯定之链。不是肯定一切,而是肯定曾经的肯定。”今天的我,没有一丝成就

感,却有十分的肯定性,不是肯定自己的书,而是肯定自己曾经的肯定——“努力做一个好学者”。尽管这本书一定存在许多缺陷,但我还是对信任我的亲人、老师、朋友和同事心怀感激。欧阳俊博士对第一章,杨胜荣博士对第八、九章贡献良多,李军先生和贾作林先生各自仔细校阅了半部书稿,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这里还应该感谢林毅夫、陆学艺、王春光、孙立平等老师,本书的前半部分其实就是与他们的思想对话,其中大部分内容可以看作是对他们的有关学术观点的补充。他们在相关研究领域做出了最卓越的学术贡献,使我有机会不揣鄙陋拾阶而上。

女儿诞生时,我想送她一个礼物,没有实现!女儿周岁时,我又想送她一个礼物,又没有实现!再熬过两个长夜就是女儿的两岁生日,这本书稿就算我送给女儿的第一个礼物吧!希望她的生活充满美、爱、成就感和肯定性!

郭强

2004年10月15日凌晨

目 录

第一章 土地一耕作制度: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钥匙

第一节 集体合作农作效率的数理分析·····	(1)
一、分析背景·····	(3)
二、两种制度下的最优劳动供给与产出·····	(5)
三、集体农作的效率·····	(8)
四、作为整体的集体的积极性·····	(13)
五、为什么不完全按禀赋分配?·····	(14)
六、小结·····	(17)
第二节 从合作化到大包干的历史与逻辑·····	(18)
一、制度变迁与绩效波动的史实·····	(20)
二、林毅夫的退出权理论检讨·····	(26)
三、1956~1961 中国农业危机原因再检讨·····	(34)
四、“天堂预期”假说·····	(37)

第二章 农民工: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钥匙

第一节 农民工概况·····	(44)
一、概念·····	(44)
二、规模与流向·····	(45)
三、基本社会特征·····	(47)
第二节 农民工流动原因分析·····	(50)
一、关于农民工流动原因的主要研究成果·····	(50)
二、同伴竞争假说:一个补充·····	(53)
三、同伴竞争机制的扭曲·····	(59)

第三节	农民工流动的壁垒	(60)
第三章	阶级阶层理论研究	
第一节	国人的阶级阶层观	(92)
第二节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的基本取向	(96)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阶级观	(99)
第四节	地位差别与流动壁垒	(102)
第五节	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	(108)
第四章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之我见	
第一节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的三大模式	(112)
一	、官方的 2 + 6 阶级阶层划分模式	(112)
二	、李强的 345 划分模式	(113)
三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十大阶层划分模式	(117)
第二节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之我见	(119)
一	、阶层分化理论框架	(119)
二	、阶级阶层结构框架	(121)
第五章	中国社会的断裂与转型	
第一节	断裂社会论	(126)
第二节	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断裂现象和断裂化趋势？	(128)
一	、工业化转型与断裂	(129)
二	、城市化转型与断裂	(132)
三	、市场化转型与断裂	(136)
第三节	改善中国社会结构不能寄希望于中产阶级	(139)
第六章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二元结构	
第一节	农民工的阶级阶层定位	(145)
一	、农民工是工人阶级	(145)
二	、农民工是工人阶级中的新阶层	(149)